



1950  
台灣  
有群  
娃娃兵

廣東省出版集團  
花城出版社

桑品載 — 著



1950

台湾  
有群  
娃娃兵

---

桑品载 —— 著

广东省出版集团  
花城出版社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1950 : 台湾有群娃娃兵 / 桑品载著. --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 2013. 11

ISBN 978-7-5360-6836-0

I. ①1… II. ①桑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80019号

出版人：詹秀敏  
责任编辑：文 珍 黎 萍  
技术编辑：凌春梅  
装帧设计：棱角视觉

---

书 名	1950：台湾有群娃娃兵 1950：TAI WAN YOU QUN WA WA BING
出版发行	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23 号)
开 本	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6 开
印 张	11 16 插页
字 数	130,000 字
版 次	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35.00 元
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：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：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## 乡愁，老了！（自序）

我写的是乡愁——乡愁的生与死。

1949年，称有二百万人跟随国民党政府到台湾，其中称有六十万军人。这些军人来自大江南北，除高官外，年纪多数在30岁左右，多数没有结婚，甚至举目无亲。

中国历史中战争频仍，但却从没有一场战争造成骨肉分离长达四十余年。国民党政府来台之初，一方面以“打回大陆，回家团圆”做凝聚士气之饵，另一方面“想家”却又成为罪状，所以禁演《四郎探母》。

长辈学者台静农感岁月消逝，还乡无望，作《老去》一诗：

老去空余渡海心，  
蹉跎一世更何云？  
无穷天地无穷感，  
坐对斜阳看浮云。

# 目 录

乡愁，老了！（自序） / 1

小孩老头一张面孔 / 1

    幼年兵 / 1

    离 家 / 5

    流 浪 / 22

    我当了娃娃兵 / 29

    少年队 / 35

    幼年兵营 / 49

    幼年兵总队 / 70

相见时难别也难 / 85

一张照片的故事 / 98

阿兵哥讨老婆 / 111

一只爱吃辣的狗 / 126

老刘要回家 / 137

向往一次战争       147

附录

台湾冷吗？——1988那年深秋 / 162

# 小孩老头一张面孔

## 幼年兵

1949年，国民党退据台湾，陆军部队里有一群娃娃兵。

娃娃兵的形成，大致因以下状况：

第一种，父兄或长辈是官兵，他们混在部队里一起生活。

第二种，在战火中与家人失散，遇到好心军人，被收留在部队里。

第三种，父母将儿子托付给认识的军人，辗转来到台湾。

那时，国民党军队因屡战屡败，士兵死的死，逃的逃，降的降，“空缺”严重且普遍。如一个连，名单上的人数是一百二十多人，实际也许只有其三分之二。但部队长不敢上报实情，因怕受到处分。上面不是不知道，却不查，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部队在哪里。于是粮饷照发，“空缺”变成了“吃空缺”。

聪明的大小部队长，为了使名单好看些，把娃娃兵的名字写入军册里。只需把年龄改一改，譬如将10岁变20岁，将12岁变22岁。如果其父亲就是营长、连长，十来岁就补名成为“兵王”上士的也有。

不过，既然补上了名，吃粮拿饷，多少派些活干。当传令

兵或者勤务兵，跑腿送公文，为长官买烟买酒，这是多数娃娃兵的工作内容。

国民党到了台湾，为的是“反攻大陆”，部队得加紧训练。孙立人将军受命练兵，职衔为“陆军训练司令官”，官阶中将。他在南台湾的凤山设立“第四军官训练班”，附设士官训练班，又将早先在上海、北京等地招募来的知识青年编组成“入伍生教导总队”，共三个团，一起驻在凤山。官、士、兵连成一线，后来被他的军系对手称为“孙立人的部队”。

还有一群女兵，驻在离凤山不远的屏东县，单位名称叫“女青年工作大队”，有两百多人。她们也是孙立人在大陆招募来的。

孙立人到陆军各部视察，发现了娃娃兵。娃娃兵身高不及三零步枪挂上刺刀，一颗炮弹扛不动，训练时体力不支，成为部队的累赘。把他们撵出去，又于心不忍，万一他们的父兄闹起情绪来，还会出现小兵变。唯一的法子，就是把他们集中起来，另成单位。

入伍生总队第一团第三营第九连本来就是“幼年兵连”。1950年夏天，该连在一次实弹射击训练时，发生枪榴弹爆炸，死伤十多人。连长、排长被撤职查办，上级来视察，发觉幼年兵里有些个儿蛮高，体力不错，便选出一些去正式当兵，留下来的，只剩两个排，等待补充。

命令说，16岁以下的都得到入伍生总队报到。为什么定位在16岁？因为17岁就可以当兵了。命令的岁数设有上限，但没设下限，因此不知道会“下”到什么程度。结果出现了一个只有6岁的，他叫郭天喜，东北人。

各部队娃娃兵先以师为单位集中，再造好名册向凤山报

到。于是“幼年兵连”扩充为“幼年兵营”，仍属入伍生总队第一团第三营，分别是第九连、第十连、第十一连。

第十一连，就是原来的幼年兵连，他们只剩两个排了，便补两个排进去。原来的为第一排、第二排，后去的是第三排、第四排。新去的年纪略小，私下称第一、二排为“老幼年兵”。

孙立人获得情报，据说娃娃兵并没有被“搜”干净，原因是，他们的父兄或长辈舍不得他们离开自己。就这么一个命根子了，要吃苦大家一起吃，每天能看到儿子，说说儿子，简直就是活着的最大意义。上级来查，把他藏起来，部队长不是不知道，只是大家老兄弟了，睁只眼闭只眼装作没看见。

孙立人闻讯光火，下达严令，没来报到的，部队长以抗命论处。

这下留不住了，部队长好说歹说劝娃娃的父兄们把孩子交出来。很好的一个理由是，孩子到了那里有人管、有书读，混在部队总归不会有出息。

命令生效，大批娃娃兵来到，加上原来的幼年兵营，人数达一千三百多人，足足可编成一个团。

但没有称“幼年兵团”，而是称“幼年兵总队”。取消营、连番号，改为大队、中队。共三个大队，每个大队包括三个中队。幼年兵总队脱离入伍生总队，直属陆军总部。

营房不够，便从凤山移驻台南。台南有座建好不久的营房，叫“胜利营房”，营房直线排列，一队一营房，最前面是总队部，最后是第九中队。大操场在左边，右边挨个儿是各队的厨房。围墙是土砌的，还没完成，后来由幼年兵用自己的脸盆端土填高打实。忙了好一阵子。

操场的围墙外是台南工学院，就是现在的成功大学。总队



部正门的马路对面是另一个营区，叫“旭顶营房”。作家朱西宁在那里做绘图官，多年前他写过一篇文章，说常在夜里听到马路对面传来幼年兵挨打的尖锐哭声。

多少年以后，孙立人向人说出了他关于成立“幼年兵总队”的想法——授以这个年龄该有的知识教育，同时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。等长大后，进军校，成为一名好军官。

他的想法却未必是别人的想法。孙立人在军系里格格不入是公开的秘密，说透了，是他书读得太多。他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，后来又进入美国弗吉尼亚军校。而国民党里的“黄埔体系”靠枪杆子打天下，孙立人说的话，常常让人“听不懂”。

更糟糕的是，他会说英文。那时台湾还有美军顾问团，团长蔡斯少将是他军校学弟，见到他得敬礼。蔡斯对台湾要做什么事，常先和孙立人商量，两人关起门来叽里咕噜说洋话，益发使人起疑心。

还有一层，那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，据说是孙立人在弗吉尼亚时的区队长。后来美国档案解密证明，艾森豪威尔曾通过蔡斯劝说孙立人担任西太平洋区联军司令。这个意思是，蒋介石得听命于他了。

孙立人没有接受这个职位，老蒋的欣慰可以想见，这大概是因为1956年爆发“孙立人通匪案”后，蒋介石只软禁他，而没有枪毙他的深层因素。

这个案子一言以蔽之，就是排除异己。由黄埔军结合蒋经国的政工体系，弄出来一个“郭廷亮匪谍案”。郭曾担任过孙立人的随从，他在严刑拷打下，在一份“孙立人通匪”的文书上以证人身份签了名。“匪”者，中国共产党也。“匪谍”在台湾那个年代是唯一以死刑论处的罪名。

孙立人从陆军总司令位置上被拉下，调任无军权的参军长。这之前，“孙立人的部队”悉数遭瓦解，入伍生总队分到蒋纬国任司令的装甲兵一、二师，女青年工作大队星散到各部队，幼年兵总队解散。

幼年兵总队从1951年起成立，到1953年解散，彼此相聚时间不足两年。

幼年兵本来就是“兵”，穿军服，出军操，有阶级，有薪饷，只不过那些在原部队当上士、中士的降级而为“二等兵”。解散了，年龄长了两岁，就当然更是兵。一千三百多人分配到三个地方：最多的一群七百余人，去学驾驶，学成后派到各单位当驾驶兵。有几十个人经过特别挑选，身体棒的，模样端庄的，到蒋介石官邸当“外卫”，也就是卫兵，不过是离蒋介石身体最远的。另有两百多人，年纪最小的，送到政工干部学校。“教导大队”专门为这些“兵”而成立，分两个中队。他们基本上接受文学校教育，但还是得“允文允武”受军事训练。

从此，“幼年兵”称呼消失了。到政工干校的那一批，称为“学兵”。先经过学力测验，最高是初中一年级，甲级班，依次而下，至辛级班。小学之所以有七个班级，有其缘故，这是后话。

幼年兵解散了，但是其“幼”如故。那之后，大家得学着怎么活下去，活好一点儿。

## 离 家

我就是幼年兵。在我成为幼年兵之前，是流落在基隆港的

一个小乞丐。

这个故事，得从1950年国军撤离舟山说起。

那年，我12岁。

国民党军队在舟山陆续出现，人数越来越多，和当时国共内战形势有关。即是：共军步步进逼，国军节节败退，到1949年，舟山是国民党在大陆少数的控制区之一，据国民党的说法，军队有十三万人。

军队有的是整批开到，有的是打了败仗的散兵游勇来投靠，还有公务员和眷属。一刹时，各种腔调的中国话同时出现，向来落后但平静的舟山群岛，像一锅烧开了的粥，热闹得沸腾。

我家在乡下，村子有个很怪的名字，叫“洋螺村”。住屋疏落，东海的水在村前流荡，海中有错落的小岛。父亲说，从门口望去不远的一个小岛叫馒头山，有一半是我们家的。不过，我从没有上去过，那里没一户人家，没什么好玩的。

祖父已逝，祖母是一家之主，她长年吃素。记忆里的她几乎都把自己关在房里念经，很难得和我们说上几句话，难得的话大半是在骂人。多年后才稍稍理解，她并不快乐——我的父亲是从小抱来的养子，母亲是童养媳，这是因为祖母只生了两个女儿，没生儿子的缘故。

而且，她的长女——我的大姑年轻时违逆父命，执意要嫁给自己选中的男人，祖父一怒之下，断绝往来。后来姐姐跟我说，大姑个性倔强，也怩了气，不来往就不来往。祖父死时她没出现，祖父死后祖母向她招手，也被拒绝。所以祖母常去二姑家，二姑嫁到王家，那个村子全姓王，村名就叫“登头王”。

我离开舟山那天，她就在二姑家。

那是个大日子，有一个连进驻洋螺村，每家门窗紧闭，当然还是可以看见外面，事后大家也都承认在看。我爬上八仙桌，半张脸贴在白纸窗上向外张望，看见大约六七十个军人，前面的骑马，后面的走路，很累的样子，有的把长枪当扁担似的扛在肩上，有的当扫帚，拖着走。

他们进入文公庙，那是我家隔壁的隔壁，是我和姐姐、哥哥读书的地方，老师姓张。后来改成“文公国民小学”，老师还是他。

我们家有两艘大船、两艘舢板，十二亩田。田租给别人，父亲是个小船主，不过自己也出海捕鱼。渔获卖到厦门、上海。有一次他回来，给了母亲一锭一两重的金子，据说那是他最赚钱的一次。母亲忙不迭地把那块金子塞进谷仓里，不许小孩子看，不过，还是被我偷看到了。

几天后，我认识了连长，他姓萧。我早在注意他，因为他对兵讲话时一看就像是官，很威风。他有马夫，有传令兵，出门时有人鞍前马后伺候。他骑的马最大最壮，棕色的，或许就因为它是连长坐骑，比别的马神气。他有根黑色的马鞭，有半只手臂长短，骑马时挥，走路时也挥，尽管他笑着，但总觉得他要打人。

我认识萧连长是一段奇怪的经历。

那天下午，村子里有一个男子经过文公庙，好奇之故吧，向里探望，庙门口的卫兵立刻用刺刀抵着他的背押进庙里，接着传来鞭打声和男子的叫喊声。不久，男子被踢出庙门。因为赤膊的缘故，他的脸上、身上都在流血。他跌跌撞撞往前行，

我正躲在大门后看他，他也看到了我。

想不到当兵的还不放过他，有两个人从庙里各提着枪冲出来，一面高喊：“站住！”

他却还往前走，这缘故我明白，他听不懂“国语”。军队没来之前，舟山人只会说舟山话和宁波话，有去过上海的，会说几句上海话，别的话，没人说，也没人懂。

当兵的立刻把他捉住，一个兵粗声问：“叫你站住，你为什么还跑？”说着，送上一个耳光。

那男子一脸茫然，又惊又怕。我突然发现，我听得懂那兵说的话，张老师教“国语”时，会用“国语话”和舟山话对照。我没胆走上去，双手抓着门框，只是小声地说：“他听不懂国语啦！”

这下不得了，两个兵立刻走向我，几乎是异口同声：“你会说国语？”

这时，又有几个军人走过来，其中一个就是萧连长。

一个兵说：“报告连长，这小孩会说国语！”

萧连长歪头看我，笑咪咪，很客气：“你会说国语？再说句给我听听。”

“说什么？”

官兵大笑，多么高兴，多么得意的样子。当时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样开心，后来知道了，当兵的说，他们说的话老百姓听不懂，老百姓说的话他们听不懂，快憋死了！

就因为我会说国语，往后我可以随意进出文公庙，为官兵当翻译，声名大噪。

但因为会说国语，有一回我差点惹出大祸。

那天去二姑家，走在半路见到几个军人，我二百五似的居

然主动向他们打招呼，说起国语来。他们立刻止步，严肃地凝视我，问：“你是不是舟山人？”

我说：“是呀！”

“那你怎么会说国语？”

看他们那样子，我害怕起来，正要转身离去，被他们抓住。

他们押我去见他们的连长，连长说出了缘故：“舟山有很多匪谍，外地来的，你是不是？”

我不知道“匪谍”是什么意思，但想一定不是好东西，就摇头说不是。我说出我家住什么地方，忽然想到萧连长，说出了他的名字。

萧连长成了我的救星，原来这位连长认识他。他立刻摇电话向萧连长求证，我还和萧连长说了几句话，这才被放了出来。

萧连长渐渐和我们全家都熟了，奇怪的是祖母居然也喜欢他，好几次叫母亲烧几道菜，请他来家里喝酒吃饭。

萧连长常夸赞我，说这么聪明的孩子，在舟山这种小地方可惜了。

国军要从舟山撤退的行动极为机密，查阅国防部军史记载，蒋介石在台湾复行视事后，鉴于舟山离台湾太远，而且舟山群岛部分岛屿已被共军占领，台湾鞭长莫及，失去舟山势所难免。为了“拳头收起来，打出去才有力量”，做出了撤退的决定。

行动从5月13日晚间开始，到16日撤退完毕。这期间，全面戒严，老百姓得守在家里，不许外出。

同时，军队开始抓壮丁。当兵的持枪冲进百姓家，见有男丁，捉了就走。怕他们逃走，双手反绑，人多就用根长绳像串

粽子似的串成一行，个别的，用枪押着走。

一天夜里，刚吃过晚饭，萧连长忽然出现。那时家里大人只有妈妈，小孩是姐姐、两个妹妹和我。祖母在二姑家，父亲出海捕鱼去了，哥哥在城里读初一住校。

萧连长对母亲说，他想带我去台湾。

母亲居然答应了。

她大字不识一个，除了舟山，没去过别的地方。把儿子交给一个陌生人，她怎么会答应？

这个答案，终我一生，不能从她口中听到。两岸相互封锁达近四十年，她在我走后十六年得水肿病去世。1988年返乡探亲，首先见到嫁到上海的姐姐，她也只是揣测，母亲有两个儿子，一个留在舟山，一个送去台湾，符合“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”的分散风险理论。

但母亲万万想不到的是，她在城里读书的大儿子，就是我的哥哥桑世载，已成为国军抓壮丁的猎物之一。荒谬的是，兄弟俩坐同一艘军舰到台湾，过了好几年才相逢。

父亲因为出海在外，幸免被抓。他回来发现两个儿子全没了，用扁担打我母亲。不止打一次，以后想起来一生气就打。

后来母亲死于上海，临终前几天，只要醒着就哭。姐姐说，母亲的最后一句话是：“我只要看到儿子一面，病就好了……”

母亲为我整理行囊，一套衣服、一双布鞋，弄好了，又翻开检查，再用一块大花布包起来。又从床头柜里取出二十二块银元和几根细金条，银元叠成一摞，碰撞时叮叮响。她剪破自己穿的夹袄下摆，用手量一量银元叠起来的高度，再比出要

用多少布，量好了，把金条贴在银元两边，就找出针线缝成一褂，小心地塞进花布包里。

她一面做一面哭，先哭得很小声，泣泣泣泣，渐渐声音大了，呜呜呜呜……

在哭的间隙里，她说：“戏文里唱的‘男儿志气在四方’，你出去以后，要有志气。”

一切就绪了，她把我拉进怀里，紧紧抱着，下腮抵着我的头顶，来回轻轻摩擦。

“男儿志气在四方……男儿志气在四方。”她说了很多遍，就这么一句。

看到母亲这样，我当然是难过的，也落了眼泪。不过，我也是兴奋的，因为，我要去台湾了，虽然我根本不知道台湾在哪里。

台湾，这名字我听当兵的说过，说那里的香蕉又大又香又甜，好吃得不得了。香蕉我吃过一次，不知哪位亲戚从外地带来的，两根手指那么粗，甜里带酸。

我会去台湾多久？端午节以前大概回不来，中秋节总可以了吧，绝不可能在那里过年的。

萧连长没有来，他派一个兵来，我认识的。他站在夜色浓浓的门外，有些不耐烦地喊了我名字两次。母亲说，好啦，好啦，一面把花布包挂在我肩上，牵着我的手出门。

母亲四处张望，轻轻说：“萧连长呢？”说的是舟山话，那个兵听不懂。母亲似乎不放心把我交给那个兵，拉着我，走向文公庙。

文公庙里灯影摇曳，人影杂沓，连里的兵有些本来住在祠堂和百姓家，现在集中了，走来走去，显得十分拥挤。



大家都认识，所以没人拦阻我们，却也不理我们。

母亲不知问谁：“萧连长呢？”

我用国语把话翻译出来。

有个排长走过来，也是我认识的。他说：“萧连长去营部了，他交代过，你儿子跟我们走。”

我又把话翻译给母亲。母亲有些不安，握着我的手，一忽儿紧，一忽儿松。终于放手了，轻轻在我背上拍了一下，我走向那位排长。

母亲没哭，缓缓转身离去。但出庙门后不久，传来了她的大哭声。

那哭声，成为我终生的梦魇。

萧连长回到文公庙时，已是午夜。热了一整天，天气渐渐凉爽下来了。我早就困了，靠着墙角，抱着布包睡去。

我是被萧连长推醒的，他的传令兵提着一盏灯站在他身后半步处，还有两个人也站在他身边，那是张老师和他的儿子张坤。

张坤和我是同学，长我一岁，文公庙里读私塾，有他就有我，当然也有他的父亲张老师。

他像个女孩子，安安静静的，话不多，总觉得他有什么病似的，小孩子爱玩的滚铁环、踢毽子、山上抓蛇、河里捉泥鳅、海滩挖螃蟹，他向来不参加。

张老师40来岁，教私塾、教国语，都是用唱的。唱时摇头摆身，头摇成圆圈，肩则左右摆动。他严格要求我们读书都得这样，他说这样读书才不会忘记。

原来萧连长也要带他们去台湾。他拍拍我肩上的布包说：“和张老师走在一起，别走丢了。东西要看好。”